

陈恭禄 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历史教科书
代表民国知识分子立场和最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

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张海鹏 中国历史学会会长
雷 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张 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谢 泳 厦门大学教授
推荐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作序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 近代史

陈恭禄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陈恭禄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35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 / 陈恭禄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08-4818-9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近代史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9178 号

中国近代史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陈大钢 傅 娉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383056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9.25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推荐序

郭世佑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再版，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可惜作者抛离这个世界已经45年了，他早在1966年就已撒手尘寰。章开沅先生在近作《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中饱含深情地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看来，时间就像山涧的溪流，驱走的是轻浮的尘埃，鹅卵石的体积与分量却只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的冲刷之中。

陈恭禄生于1900年，江苏丹徒人，自幼接受私塾启蒙，十七岁考入扬州的教会中学，积累了丰厚的英文阅读能力。1921年，录入六朝古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嗣而转入农学，最后投身于历史系。根据该校的本科生导师制，在美籍系主任贝德士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用力甚勤。

在他看来，国人的历史知识比较浅陋，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又未必切合于中国，却急于运用，未辨轻重缓急，历史著述的质量参差不齐，好书难找。就在毕业那年，即1926年，陈氏始萌撰述近世国史之念。鉴于当时国内还缺乏日本史的阅读书籍，就先著《日本全史》与

《印度通史大纲》。任教南京明德中学才一年，他就被聘回金陵大学历史系，并受贝德士之托，讲授中国近百年史，还在《大公报》连发关于晚清史的文章，向中央大学萧一山教授的成名之作《清朝通史》频频提出挑战，史坛为之瞩目。及至1934年，《中国近代史》集八年之功，终于截稿成册，叙述范围起自晚清鸦片战争，迄于作者止笔前的1930年代初，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该书被推荐为大学必读书目，两年之内接连五版，洛阳纸贵，称誉当时。即使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还被再版四次。当时，为了面向社会读者，作者还删繁就简，另编《中国近百年史》，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刊行，后者比蒋廷黻5万言的《中国近代史》早出三年。

在当时，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某些篇章确乎别开生面，为数更多的却系介于历史叙述与时评之间的政论性作品，历史与政治难舍难分，严谨翔实之作并不多见。这也难怪，国难当头，书斋鲜静，醉翁之意多在论世，近代史学科建设尚属草创，史料整理却非朝夕之功，用罗家伦的话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较之许多同类近史论著，陈氏最重资料，言之有故。他首先搜集“原料”，参照时人记录，辨别作者的身份与目的，征之以其他同类资料，考证真伪，只有能够印证的资料方可采用。他还参照时人的议论，辨析利害，然后构建史实，叙述史迹造成的背景，多种历史要素的关联，还有“过程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力求“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辅之以清晰简约的文字。作者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勉成信史。当然，任何论著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加上当时的学术条件有限，作者的史料运用并非无懈可击，但他确实在证实与证伪两个方面都下过一定的功夫，取舍审慎。例如，英人白克浩司(E. Backhouse)伪造《景善日记》的真相在当时还没有为中外学界所澄清，罗家伦移校中央大学前后，为门人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所撰引言中，还在强调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亲自看过抄过”，该日记的原稿“真实无疑”，陈恭禄虽然也不怀疑那本伪造的满人日记本身存在的真实性，但通过比照其他记载，就对日记所叙某些史实多有存疑。他在《中国近代史》末篇“史料评论”中就此为例，曰：“如景善日记，为外人所得，视为义和团时之可信史料，实则所记朝廷大事，多为不足深信之传闻。”陈氏的这一见解就已高出同时代的罗家伦等人。

又如，在论述辛亥革命时，陈氏既不迷信国民党大小官员那些铺天盖地的“歌德”回忆，也不因南京国民政府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创业史而跟着凑热闹，尽量中性叙述。陈著出版前，国民党中宣部的审查者不加商量地强加删改，还不让作者过目，可惜我们已无法找到原稿，就从被删改的文本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对孙中山的神化色彩，只见

直呼“孙文”共71处，与孙中山有关的“孙氏”6处。所用“革命”一词虽有185处之多，则多从事物变革的方式与程度着眼，并不掺入价值评判。相比之下，弃学入仕的蒋廷黻就不敢直呼孙中山，在区区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里，除了称“总理”2次，“中山先生”8次，称“孙中山先生”则达34次之多，还专设一节“贯彻总理的遗教”，同蒋介石与国民党保持一致。

陈著既不像思想先行的蒋廷黻，常常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形成论断。应当指出，作者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影响颇深，对英国等西方列强的侵略实质与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口问题出路等方面，结合中西文献资料，给予平实叙述。他在自序中说：“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只要我们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党同伐异的学术教条，则不难发现，陈恭禄的治学态度与史学理念至今还经得起推敲。政治风云的变幻不曾影响陈恭禄书斋怡乐的学术追求，进步学生的劝慰使他放弃了离宁远走的设想。詎料此后不久，金陵大学就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呼号声中歇火关门，邻近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陈恭禄就地转入南大。正是其教会中学与大学的学、教经历，加上红极一时的文霸陈伯达曾在战斗力很强的《四大家族》一书中给陈以“反动历史学家”之界定，政治权力的蛮横就让本分向学的陈恭禄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饱经世态炎凉。翻开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编印的《教学与研究汇刊》，在1956年12月印行的“创刊号”中，篇首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

陈著原本既没有用过蒋廷黻喜欢用的“近代化”等词，也不曾使用过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与历史学者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转述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他在自我批评中整段地复述毛泽东对近代史的论点与革命史观，还称“毛泽东同志”，还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承认自己在私塾“受了封建教育”，在教会学校里“受了更深的毒素”，即“帝国主义思想”，那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还说，“站在官方立场，我就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反动有毒素的书籍”。此类文字将我们带到当年思想改造的现场。作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乎自残，应该说很卖力气，可以交差了，结果还没完，这不仅出乎陈恭禄的意料，也超出了吾辈今天的想象。

有位西方人士说：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欧美版的法权观念肯定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一年之后就是反右风暴，再过一年便是“史学革命”，连自己都白纸黑字承认“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陈恭禄教授在劫难逃。据茅家琦先生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约请陈氏重写《中国近代史》。结果，当他交上第一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审稿意见就断定存在“严重错误”，重写之议就不了了之，无论从哪个主义来看，保命总比出书更重要。

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异常复杂，前人留下的某些历史难题至今仍需求解，而近60年来，大陆高校的近代史教材虽然多达200余种，却几乎都是以重复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为主旨，千人一面，千嘴同声，与港、台地区的近代史教材相比，差距甚大。早在20多年前，日本青年学者奥村哲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学界“历来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我们却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保持着“让别人去说吧”的自信态势，怎不令人扼腕。如果说罗家伦、蒋廷黻对助手郭廷以的期望与敦促，催生了郭氏《近代中国史纲》一书的完成，那么，大陆地区以往绑架学术的意识形态与鼓噪的政治运动，就斩断了陈恭禄可望修订《中国近代史》的机缘。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族才是幸福的，我想补充说，只有不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的国家与学术才是幸运的，如果学术总是依附权力，那就只能互相折腾，顶多为印证美国历史学家亨利（Henry Adams）的那个偏见做出贡献：“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煽动仇恨的组织。”可以说，生活的悲剧往往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是错过了什么，陈著《中国近代史》的修订亦然。

时当信息革命与地球村的时代，遥控器、电脑鼠标与手机已经成为挑战纸质传媒与书本阅读的三大利器，一本60万言的民国旧著未必能特别吸引整天在工商文明的喧嚣中穿梭的上班族与读书人，陈氏的叙述方式又未必能适应那些已经习惯了三级以上目录的章节文体与数字化条理形式的读者偏好，也不容易契合除了大白话还要每年“给力”追新词却不觉得“囿”的快餐式阅读，但陈著毕竟具备雄厚的中西资料基础与解读视野，而且几乎每篇（章）都能独立成章，作者还不乏探本溯源的功夫，信息丰富，知识性强，只要开卷，总会有益，何况解读的层面只有兼听则明。

近代国史中的许多难题实乃今日国人挥之不去之题，无论是已有的近史教材与相关定论，还是“百家讲坛”式的文化秀，还是写的比读的多的说史网文，均已无法满足读者与日俱增的品史需求，无法解答某些困惑连篇的近史谜团。究其原因在于，历史既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老姑娘，也不是文化的口红，它的魅力与生命力都在于真实，历史读物的价值首先就取决于反映真实与解读真实的程度。只有借助于可靠而丰富的史料，

才有可能确保历史叙述的真实可信，一旦离开某些基本的史料，离开经过职业性的史料审视所重构的史实，只会越说越糟，越读越乱，越听越烦。至于不同视角、史观与不同风格的历史解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神州很大，历史又与现实一样，复杂难辨，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来解读历史或现实，就像同场一首歌那样排练得高度一致，那么，一人之外，都是一群既听话又学话的鹦鹉，都挺有耐心，差别只在于音域的宽窄、音量的高低与音质的好坏，顶多再加羽毛的颜色，眼睛的大小，还有勤奋的程度与表现欲的强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消失之前的苏联，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足以超出化学添加剂的威力，使人催向成熟了。

陈公虽逝，陈著可传。史海茫茫，谨此忝序。

2011年3月10日深夜草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四版自序

于今书业不景气之时期，《中国近代史》居然于发行后四个月内重版两次，又为读书竞进会选为大学组必读之书。社会上之意外欢迎，出于著者意料之外，心中愉悦，自不待言，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常自责。心尤不安者，无过于误植之多。其造成之原因虽多，固不能尽诿过于人，著者盖有相当责任。书于三月出售，著者读完一遍，发现不少之误植，即于四月函告出版人谓书再版，望挖正后付印，而出版人复称再版现已印成，唯有附印勘误表之办法。近者更有发现，并知平装本将即付印，当能一一挖正。改正多为误植，亦间有一二叙述之史迹。

书稿于去年夏寄出，一年之后，再读此书，感觉尚有一二应改之处，顾改文稿牵及纸版能否再用，且为时太久，而社会上需要此书甚殷，故暂作罢。今可于此说明者，共有三事。一、袁昶、许景澄奏疏实不足信，不如删去。二、景善日记著者初未能得原文，书中译文，当改用原文。三、政府废两，计量改用公担，而书仍用旧制。读者当知关银一两抵一·五五八元，一公担抵一·六五四担。他如论者谓书叙述外交太多，关于学术者太少，则所见不同，著者自有立场也。倘有修正，亦当俟诸将来。

余授武大史学系一年级中国近世史，采用此书为教本。误植亦有学生告知者，深为感谢，并志于此。

陈恭禄序于半山庐 一九三五年五月

自序

一国现状之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之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常占重要之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时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之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社会科学失其赞助，将或多无根据。近代史之著作，久为国内知识界之急切需要。

余自识字以来，颇留心于故事，及入中学大学，深知吾人历史知识之浅陋。关于社会科学之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之社会，运用之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力，为之减低。不幸迄今近代中国史之著作，仍在失望之中。民国十五年，著者萌有著作之志愿，会以人事环境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

十七年，于金大担任教职，知其需要之殷，勉力进行，二十一年春，完成十三篇，决定分卷出书，由新月书店印行，初不知其营业失败也。双方议定至迟冬季出书，书店迟至次年五月，上册排校方始完毕，定于六月发行，忽又搁置数月，据称新月并于商务，归其印行，而书仍未出售，并置去函不复，本年二月，始与当事人相见，收回原稿。著者以全书文稿已成，望其迅速印成，最后决定，归商务印行。

全书共十九篇，内容可略见于目录，初拟命名《中国近百年史》，而坊间书用此名者甚多，免相混乱，改称《中国近代史》。近代二字，本无确定界说（史期区分，原极牵强，不过因其便利而已），史家划分史期，常不相同。愚意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作一时期似较便利，且书内容不限于百年内之史迹，故定名曰《中国近代史》。著者著书之目的，深愿赞助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吾人处于今日议论古人，原非难事。著者之论断，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非别有好恶也。综之，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赜，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其材料之多，浩如烟海，第十九篇略论史料之种类与价值，事迹之繁，固不能一一叙述也。

古今史之性质不同，方法亦各迥异。古史之存于今者，或为编年，或为问答，或为传体，或为纪事本末，或为文献，名目不一，要多因陈抄袭。其材料或不问来自何方，编纂者或不辨其真伪，书中或为诋墓毁墓文字，或为按年列举之政令大事，或不问其是否实行及行后之利弊，杂然抄入。其一部分诚所谓“断烂朝报”，或“流水账目”也。吾人读之，殊难明了整个社会之情状。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料，及时人纪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为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势力，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此史学者不易养成之原因，而固吾人今日之正鹄也。著者编著此书，不过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而已。

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读者之意见，或同或异于结论，著者固无强人从己之意，且书非宣传作品，读者多为成年之人，当可根据事实，自由表示意见也。更当说明于此者，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

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近百年来，内政外交交相影响，中国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主权减削，内政往往深受外国之影响，外交之篇幅颇难预定，乃听材料自行决定。书中地名以政府之变更，改易旧名，此种习惯，原为专制帝王改制之余毒，对于吾人则颇增加困难。著者叙述过去之史迹，自当仍用前名，但为便利读者起见，常或附注今名。关于地图，著者知其重要，不幸不能绘画，插入书中。事无奈何，唯愿读者自备地图参看。

人名亦有困难，君主避讳不名，徽号字数繁多，庙号繁杂，均不便于记忆，民间用其年号，清帝除太宗而外，未曾改元，举其年号，人皆略知其事业，今仍照用，代替其名。大臣之见于史料者，或称姓名，或称字号，或称官名，或用地名，或称谥号，变化繁杂，著者为便利之计，多用姓名。外人名称，以译音之故，常不一律，作者将其划一，且多附注原名。国名载于旧档者，或先后迥异，或交相杂用，如英或称佛郎机，或称大西洋，或称红毛，非外国书籍证明，殆难辨别。葡萄牙则称大西洋，美称米，法称佛等，书中均改用今名。

年代旧用皇帝年号，或用甲子，近时或以孔子诞辰，或以民国成立之年为纪元。自今观之，多不适用，清帝于嗣位之次年，诏改年号，其先，帝多改元，积时既久，推算困难，如咸丰元年，读者或不能即知其距今若干年也。甲子计算，亦常不便于用。新法纪年如孔子诞辰，尚未通行全国，效仿西法，徒为增加困难，清代史迹，用民国纪元前计算，颇感不便，对于吾人亦无所得。著者为便利读者起见，多注明公元。英人葛麟瑞(Charles Kline)所著之《中西年历合考》，及陈垣之《中西回史日历》等书均极便于检查，更附道光以后之年历对照表于书后。至于年表，说者谓为史书所必备，实则不然，史迹绝非年表所能形容，且表非详细说明，多无益于读者。吾人固不必墨守古代之体例也。

此书编著之初，颇赖友人章诚忘等之赞助，又蒙亲友抄写，皆深感谢。书中所叙之事实与议论，与任何人无关，著者一人负责而已。书为著者关于中国史有系统之第一作品，深愿读者有所指导，并书于此。

陈恭禄自序于珞珈山 一九三四年五月

上卷目录

推荐序 郭世佑 / 1

四版自序 / 1

自序 / 1

第一篇

鸦片战前之中国 / 2

地理上之影响——中国民族——清帝之入主中国——中央官制——地方官制——政治上之积弊——财政之情状——人口激增与生计困难——秘密会社之活动——叛乱之迭起——对外之观念——古代中西之交通——中国所受外国之影响（物产、思想、文学、科学、美术等）——闭关思想之成立——葡萄牙人之东下——耶稣会教士——西荷诸国人之相继来华——中俄之交涉——国际贸易之情状——管理外人之方法——法律问题——困难之症结

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 30

律劳卑之来粤——平等待遇之争执——交涉之恶化——困难之症结——缄默期内之大事——商欠——鸦片之略史——鸦片畅销之主因——烟禁之议——林则徐之禁烟——义律缴交鸦片之经过——禁烟之希望——林维喜案之严重——清廷之主战——英国之宣战——军备之比较——定海陷后朝旨之中变——琦善和战之两难——道光再主用兵——广州之屈服——英舰之北上——浙苏战守之失败——国内纷扰之情状——和议之经过——南京条约——和议之评论——战败之原因——政治上之弱点

第三篇

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 56

中英善后交涉——中美订约——中法交涉——条约中之要款——耶稣教之弛禁——香港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五口开放后之情状——鸦片输入之激增——对外思想之不变——青浦案件之解决——广州人城争执之严重——三国修约之失败——海盗与亚罗事件——混战与报复——西林教案——联军来华——广州陷后之情状——四国公使之通牒——和议之情状——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朝廷挽回津约之失败——条约中之要款——换约之起衅——战事之责任——朝旨之中变——联军第二次北上——和议困难之症结——巴夏礼捕后之交涉——咸丰之决心议和——和议之条件——清代外交之评论——中国对俄所受之损失

第四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 / 92

黄河改道及其影响——人口激增——秘密会社之活动——财政之困难——政治之腐败——广西之情状——洪秀全之略传——上帝会与团练——洪秀全之起兵——起兵后之时机——攻扰六省之经过——太平军中之思想——文化之摧残——战胜之主因——太平军、清军、人民、迷信、种族思想、女子、军械——清廷应付之方略——洪秀全之失策——北伐军之失败——江苏境内二军之相持——太平军之西征——曾国藩练勇之困难——讨贼之檄文——檄文之批评——湘军出征之战绩——湘军战胜之原因——江北、江南大营之败溃——全国纷扰情状之一斑——经济制度之紊乱——人民所受之痛苦——饷需之榨取——太平天国与外国之关系

第五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续前) / 120

洪秀全之宗教思想——三字经——洪秀全之天国——上下阶级之森严——朝廷情状之一斑——军政与严刑——公田之计划——天历——天国中之妇女——消极之禁令——内讧及其影响——太平军之战绩——湘军克复安庆——陈玉成之败死——常胜军之成立——太平天国末年之情状——外人之观察——淮军之起——湘军近逼南京——华尔死后之常胜军——戈登之战绩——苏州杀降之事件——太平军之余支——湘军攻陷南京——太平余众之命运——捻军之大起——平捻——

清廷治苗之失策——湘军平定苗乱——战争期内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人口减少之估计——内乱之评论

第六篇

内政外交 / 154

清季之政治情状——咸丰死之政变——同治家庭之惨剧——承继大统之问题——慈禧之专政——光绪、慈禧之关系——宦官之乱政——朝廷之情状——地方长官之权重——仕途之冗杂——军队之腐败——财政之困难——曾左二氏之失望——李鸿章之观察——台谏之积弊——汉族之移民——人口之问题——总理衙门之创立——外国使臣之地位——驻外公使之派遣——大臣对外智识之幼稚——外交上之主要问题——海关之改组——香港、澳门漏税之解决——海军之创设——机器局与陆军——招商局之成立——铁路之兴筑——电报、电话及邮局之设立——新教育之失败

第七篇

内政外交(续前) / 190

觐见之争执——外使之人觐——遣使之困难——斌椿游历之失败——蒲安臣之出使——驻外使馆之成立——条约——滇案之交涉——烟台会议——交涉之评论——中德修约之交涉——外商之贪心——反对教士之传说——教案之迭起——天津教案之严重——藩属之观察——新疆叛乱之平定——伊犁之交涉——中日之关系——中国对于安南之失策——和议之失败——战争之经过——和议之成立——交涉之评论——缅甸之丧失——西藏交涉之开始——帕米尔之交涉——外人之赞助中国——华工贩运之惨史——国际贸易之发达——输出输入之物品——国内情状之不变

第八篇

中日交涉 / 230

清初中日之关系——商约之成立——副岛种臣之来聘——日本之出兵台湾——台案之解决——日本兼并琉球——琉案交涉之失败——朝鲜之概状——日韩之争——朝鲜之订约通商——中国对韩之政策——朝鲜之政变——中日天津条约——二国合作之计划——修约之失败——袁世凯之活动——朝鲜政治之腐败——中日军备之比较——二国出兵朝鲜——改革韩政之争论——战事之责

任——清兵之败出朝鲜——海上战争——朝廷之情况——奉天境内之战——北洋舰队之消灭——最初议和之失败——李鸿章之渡日议和——和约之成立——朝臣之议论——三国干涉——换约——割台之始末——交涉之总论

第九篇

战后中国之危机 / 272

外交上之新形势——外债——中国借款之困难——法国之野心——俄国侵略之计划——中俄密约之成立——俄国经营之东省铁路——关税之交涉——铁路借款之争执——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国对华之政策——英租威海卫等——日意二国之要求——列强在华之铁路承办权——中国损失之总计——门户开放政策之成立

下卷目录

第十篇

变法运动 / 304

国内之积弊——变法之阻碍——教士之影响——士大夫之思想——变法者之辩护——变法之动机——康有为之活动——变法之鼓吹——政府之筹饷练兵——新事业之创办——慈禧、光绪之疑忌——康有为变法之计划——光绪诏定国是——新党之进用——新政——反对变法之主因——反对者之议论——新法推行之困难——变法志士之大无畏精神——太后之阻挠新政——袁世凯之变节——康梁之出险——变法志士之受祸——旧制之恢复——废立之阴谋——结论

第十一篇

义和团之扰乱 / 342

反对外人之心理——教案困难之分析——人民生计之困苦——财政之窘状——练兵——秘密会社之活动——国内之纷扰——义和拳之略史——山东拳乱之势炽——朝廷之态度——直隶拳乱之情状——外兵入京保卫使馆——主战派之火焰——拳民入京后之情状——塘沽炮台陷后之混战——御前会议——宣战诏书——宣战后之北京——北方之惨杀——教士

第十二篇

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 366

五大臣之遇害——朝旨之中变——护送公使出京之平议——刘坤一之保境安民——天津之陷失——联军入京之经过——车驾出京之情状——北京之纷扰——京外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天津都统衙门之威权——德俄之野心——下诏罪己——李鸿章之失策——惩办祸首之交涉——和议进行之困难——条约中之要款 结论——中国之屈服

第十三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 / 392

变法之倾向与主张——改革之困难——预备立宪——朋党之排挤——言官之地位——人民觉悟之表现——政治改革——官制军政法律——新教育之创办——盲然奖学之流弊——实业之奖进——废八股——满汉平等——谕放脚——严禁鸦片——帝及太后之病死——亲贵大臣之重用——咨议局与资政院——秘密会社之活动——兴中会及同盟会——光复会等——会党活动之方法——国有铁路政策之决定——川路争议之严重

第十四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 / 426

武昌革命之经过——清廷应付之策略——各地之响应——革命之势力——建设之精神——清廷惊惶失措之窘状——鄂宁两军之战——临时政府成立之经过——和议之进行——袁世凯之阴谋——清帝之逊位——国内之政治问